

高汾老师去世十年了,很怀念她。

1986年,66岁的高汾老师刚从《经济日报》副刊部离休,便被陈铭德、邓季惺二老请去。两位老人当时被复刊后的《新民晚报》聘为顾问,他们很想为晚报做点事,无奈年迈体衰,力不从心,于是向报社提出,希望由高汾老师承担晚报特聘驻京记者一职。他们这个提议是有缘有的,因为1944年高汾老师从江西来到重庆,夏(衍)公让她进《新民报》担任记者,采访文化和社会新闻,抗战胜利后还在上海《新民报》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她出色的表现,得到了陈、邓二位负责人的赞赏。正是这段因缘,让高汾老师觉得不好推辞,就应承下来。于是晚报在她家安了一部传真机,备了一些工作用报,就这样,高家便成了新民晚报驻京办事处。

高汾老师的主要任务是采访京城文化新闻和为“夜光杯”组稿,其中副刊事宜,由我和她对接。从此,每当我拿起电话听筒,听到一声“严建平同志”(高汾老师习惯称同志),就会兴奋起来,因为她准有好稿约来。

1988年秋,我去北京组稿,高汾老师替我联系了二十多位名家,当时不兴请客吃饭,所以一家一家跑。其中拜见两位前辈遇到了困难,一位是钱锺书先生,他不愿见记者是出名的。幸好晚报分管副刊的沈毓刚先生曾是钱先生的学生,经他联系,钱先生终于同意见我。另一位就是德高望重、对晚报有恩的夏衍老,他因为年老体弱,已不大见客,所以迟迟未获答复。所幸夏老是高汾老师的引路人,1938年,高汾老师和姐姐、母亲从江南逃难到广州,举目无亲,生活无着,是《救亡日报》接纳了她们,在夏衍、廖沫沙、林林等报社领导的培养下,高汾老师和姐姐高骥成长优秀记者,夏衍还亲切地称呼高

家庭相册里有一张二姐念大学时的照片。那时,她身材修长,两条乌亮的长辫到腰,青春风华。转眼,二姐已80岁了,满头银发。但她五月,还精神抖擞地和姐夫去登了泰山。

八十岁,按风俗是要做寿的。我和夫人商量着,该给姐送什么寿礼?送钱,二姐是会拒绝的,有点俗气。我想来想去,还是送健康。二姐退休后一直在学中医,养生课。她对我说:70岁后,应该是用钱换回健康的年代。记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说过: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是用健康去交换身外之物。我决定送她精心包装的石斛。出发前三天,夫人又出一招:加送寿桃。我心领神会,江南无锡水蜜桃,姐最爱。我马上在网上订了2箱无锡水蜜桃快递到北京。生日宴的包房雅致而有艺术韵味。我们边喝咖啡边回忆青春岁

汾为“小女孩”。因为这层关系,再加上夏老对《新民晚报》的感情,最终夏老同意意见我了。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丁聪先生家,高汾老师电话追来,兴奋地通知我,让我下午去大六部口见夏老。

在高汾老师的关照下,这次北京之行很顺利,临回上海前,高汾老师还特意请我到她家吃饭,记得有一道汽锅鸡。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只陶制的汽锅,所以感觉特别亲切。

1991年,晚报在北京设立记者站,由孙洪康担任首任站长。高汾老师觉得自己已完成任务,萌生了退意。因为我和高汾老师联系密切,报社领导让我出面,向她郑重表示:这些年高汾老师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,报社不会忘记。记者站成立后,您不必上第一线采访了,但是希望能帮助年轻记者熟悉情况,一些重要的稿件还得您出面组织。特别是“夜光杯”,还需要您继续支持。最后,我动了感情,说“高汾老师永远是新民晚报的荣誉职工”。

高汾老师不愧是晚报的荣誉职工,她一如既往地为报社的事操心。她约稿从来不会碰钉子,因为她善良、周到、负责任,时时处处为作者着想,让人无法拒绝也不忍拒绝。袁鹰老师曾用敬佩的口吻讲过一个“笑话”:那年元旦,他和高汾大姐在人民日报宿舍大院相遇,互致新年好。话音刚落,高大姐就向他约稿。袁鹰老师笑着说,我的老大姐,今天这个日子,就是你们丁法章总编在此,也不会开口约稿的吧。高汾老师依然盯住不放,再三说,有稿别忘给“夜光杯”。

高汾老师约稿,也不是眼睛只盯着名人,她注意发现新作者,只要报纸上出现好文章,特别是年轻作者写的,她就会记下来,然后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,约写稿件。我听得钩剑兄说过,上世纪90年代初,高

近些年汪曾祺差点成了“网红”,常听到年轻人提起他或向我打听他的书。去年我和几位朋友,就专程驱车赴高邮一游。在那家打着汪氏旗号的“棋菜馆”,狠狠地大饱了一餐。但吃了些什么现在也不甚记清了,只记得对店员说,但凡当年汪曾祺推崇或发明的菜,都挨个来一遍。所幸“汪氏招牌菜”并不太多,众人皆大快朵颐,还直呼性价比蛮高。可见这一切,都不是冲着菜而是冲着“汪曾祺”去的。一位昔日的文人作家,作品经历了半个世纪,还那么令读者喜欢,他的小说和散文,至今仍依然有人读,能畅销,关键是还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,



花 (纸本设色) 卢甫圣

汾老师托人找到他,约他给晚报写稿。后来又亲自给他打电话,说很喜欢他写的短文,特别是知道他是个年轻的作者,就更希望他多为晚报写稿,这样才能使一张老报纸永远朝气蓬勃。从此,钩剑和“夜光杯”结下了不解之情,一直写到现在。

高汾老师就这样勤勤恳恳地为“夜光杯”作嫁衣裳,可少有人知道,她1938年18岁进入《救亡日报》,同年入党,在抗战时期的广州、桂林、重庆,她就是活跃于新闻界的“美女记者”了。她曾在郭沫若、夏衍直接领导下工作;她采访过的政界、军界、文化界人物无数;她曾在香港和茅盾等文化界名人一起避难,被东江纵队营救后,返回内

地路上又和邹韬奋同行。新中国成立前后,她参加并报道过开国大典、政协会议、抗美援朝。她倾听过聂鲁达、爱伦堡,面对过乌兰诺娃;她的朋友,几乎都是文化界的风云人物。她在“夜光杯”上发表了不少怀人记事的散文,感情深挚,动人肺腑。九十岁那年,她写了最后一篇文章《百岁林林》。当时我暗暗祝愿,期望高汾老师也能寿登期颐。然而,天不遂人愿,高汾老师缠绵病榻几年后,还是离去了,享年93岁。

后来我听宝林兄(高汾老师的女婿)说,自他接替老太太晚报特约编辑之职后,老人还是心心念念想着“夜光杯”,在病重的时候,她和家人说,想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,为“夜光

大领导。你猜她年龄多大了?50岁不到。她已经快60岁了。哇,一点也看不出。她年轻时曾得过一场大病,人衰老得像老太太。为了去国外治病,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在德国医生的指导下,她积极进行人体脏器功能恢复。根据自身的亲历,她悟出了新理念:精准体检知彼知己,精准治疗防未病,高端康养提升人体各项功能。我们夫妇一下子成为康养概念的粉丝。海南岛的国际医院和康养基地,也去体验了。

国际医院的建筑外形像一艘驶向蓝色海洋的游轮。“游轮”的中央是一棵当代艺术大师设计的生命之树。整座医院显得静谧有序。病房是酒店客房的氛围。我们听从专家

能排“老三”的汪曾祺

管继平

形成了“汪迷”无数,那就不简单了,也不仅是“网红”二字可以涵盖也。

有许多文章都把汪曾祺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”,也有说是“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”,其实这种称号都当不得真,说说而已。就譬如像“最后一位闺秀”之类,我至少读到有六七位著名女史被誉为“最后闺秀”的,究竟谁为“最后”还真不好说,反正“最后”之后永远还有“最后”。这就像自称是某某大师的“关门弟子”一样,即便说的是真,但不料老师的“门”并没有“关死”,往往只是虚掩着,一旦遇上合适的,“门”就又开了。

不过,汪曾祺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倒确实是真。他的性情,他的文风以及他的兴趣爱好,无一不透出那种旧式文人的风范。文人其实还是有新旧之分的,如果借用孔子的那句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”,那么正好前者为旧,后者为新。这里所谓的“新”与“旧”,或许可用文人的生存状态来划分,旧式文人的状态是休闲型的,读书写作首先是为了寻求自己开心;而新式文人状态则是生产型的,他们的创作总是以提升或教导他人为己任,始终怀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。当然,孔子所说的“今”,对我们而言已经很“古”了。我之所以认为汪曾祺先生属“旧”,也是从他那自在开心的状态来判断的,大概是受家庭的影响吧,汪老的身上一直带有一种“古风”。他的文章颇有画面感,闲适散淡,日常中见出趣味。譬如他在一本自选集的序言中就说:通常“自选集”,应是从大量的作品中选出自认为比较满意的。而自己的作品因数量本来就少,若选得严,就所剩无几了。于是他只能像老太太拣菜那样的宽容,有时把拣下扔掉的黄叶、枯梗,拿起来再看看,觉得凑合着还能吃,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。“常言说:拣到篮里的都是菜,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

这样。”这个比喻很家常,但非常贴切。古人云“文如其人”,我们从他的这种文风,基本就能感受到他那休闲从容的文人状态。

因为闲适,旧时文人作家中擅书能画的不少。书画可以怡情养眼,鲁迅不是有“聊借画图怡倦眼”句么?所以汪曾祺也是,得家庭的熏陶,他儿时就非常喜欢画画和写字。他的画与他的文章气息非常接近,写意的蔬果虫鱼,逸笔草草。有时几颗土豆香菇,几根葱蒜,也照样淡然入画,读来非常的轻松日常,仿佛也在时时问我:你是哪根葱?

汪曾祺自出生起在家乡一共生活了十九年,此后仅晚年先后回乡探访了三次而已。然而就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生活,却成了他最难忘的记忆,也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。他最著名的小说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异秉》等,题材和故事背景均来自于故乡,至于写故乡风物的散文,那就更多了。所以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烙印,绝对是影响他的整个人生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,已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了,但仍不忘幼稚园教过他的王文英老师。那一年他初回故乡时,听说当年的王老师仍健在,于是就带上两盒北京的特产果脯,

专程去看望了老师,并认真写下了一页诗笺。据说那一天王老师特别感动,汪曾祺告别之后,她捧着这一页诗笺,一读再读,不禁老泪纵横,哭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她对自己先生说:“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,还没有一个来看我的……”

不过照常理来说,一个人远走他乡几十年,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创业的艰辛,若还能想着再度返回看望当年老师和故友的,多半也是功成名就的“成功人士”,衣锦还乡皆大欢喜,不仅自己面上有光,乡人也能以你为荣,如“混”得一般就只能作罢了。也难怪,王老师的学生中谁还能如汪曾祺那样享有大名呢?不过汪老自己还是很谦虚,面对朋友们自豪地说“我们高邮,古有秦少游,今有汪曾祺”之语,他还是不失幽默地纠正道:“高邮出名的还有咸鸭蛋呢!我就排老三吧。”



答说:“我认为能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。”

语言学大师赵元任,在常州读中学时的中文

老师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,1910年他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留美考试,名列第二,留美期间,先在康奈尔大学,后去哈佛大学研究院,又到芝加哥和加州的柏克莱学习。他学过数学、物理学、哲学、心理学,还正式学过音乐。此后才研习语言学理论和实验语音学。他于戏剧、文学、摄影都有很深的造诣,被称为“跨学科研究的楷模,多专多能的学者”。

鲁迅先生转益多师,方成一代文化巨人。少年鲁迅随塾师寿镜吾接受过旧式教育,留学日本跟藤野先生学医,又曾跟章太炎学习。鲁迅在佛学和美术上都下过功夫,对达尔文、尼采有深入的研究,他的文学、散文,对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、塞万提斯、果戈理、安得烈夫、科罗边珂等皆有所借鉴。

转益多师,博采众长,始得大视野,成大格局;转益多师,方能青出于蓝,超越前贤。二十世纪初的极简主义美学雕塑大师康斯坦丁·布朗库西,最初学的是木匠,后师从罗丹,可是不久他就离开了。他希望自己可以超越古典的传统,对朋友说:“在大树的阴凉下,什么东西也长不了。”布朗库西以石头、金属和木头为材料,探索把外形简化到最低限度。有评者称:他雕塑的不是东西的外表,而是东西的思想,或者东西的本质。

学习前人是为了超越前人,而前人的东西则是后人的阶梯,当实现了某种超越之后,对前人留下的财富,决不可以轻视视之。否则,不要说进步,恐怕连生存也是困难的,所以,杜甫警示说:“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杯”做点事。这真是让我无比感动!

2014年,我参加了《上海市志·新闻出版分志·报业卷》的编纂工作,在写到晚报“人物篇”时,我想到了高汾老师,她虽然不在编,但在晚报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出过特殊贡献,应该收入志书。经向两位尊敬的主编请示,得到了他们的明确肯定,高汾老师的传略被列入这本上海报业的大书,她的英名与新民晚报永远连在一起。

杜甫是诗人,也是诗评家,他的《戏为六绝句》,开了以绝句论诗的先河,为后世诗话所宗,被誉为“千古操觚之准绳”。这组绝句的最后一句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,是他纵横诗笔数十年之后的经验之谈,诚为金针度世的良言。

转益多师自然不限于写诗,凡学问之事都是可以奉行的。物理学家丁肇中,早年跟随杨振宇,一年后去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,两年后加入美国物理学家莱德曼教授的团队,又过了两年去了麻省理工学院。有记者问他为何频繁换地方,他回

医生建议,在病房里静躺着输液。康养基地,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喝睡玩。这里的床有催眠和促进血液循环的功能。我的睡眠不好,体验一种新颖的“疗愈舱”,它利用死海原理,向舱内输入一种液体,可以让你漂浮起来,十分钟即可在轻微的音乐中舒服地进入深睡状态。这里的一日三餐,都是“地中海式的营养搭配餐”。早餐前,还有营养师根据每人的身体状况,指导你科学进餐。

体验很快结束了。夫人脸上荡漾着享受生活的幸福感,又有点可惜,一下子花掉了许多钱。我抚慰她:人至夕阳,健康无价。

满足自我爱好的消费是最营养的心灵鸡汤,找自己喜欢的所在就好。

我的消费经费:刘芳